

王晓明：抗拒庸俗的转身

■文汇报 文汇讲堂工作室 文学季采编组 马栋予(华师大中文系博士生) 文汇报 李念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中国知识界转变得比较慢,但转变是正常的

文汇讲堂:您在1990年代末新世纪初的“转向”是学界的共识了,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家洪子诚在《两个王晓明》中这样描述您,两个王晓明,一个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一个是当代文化的实践者,从研究者到实践者,您现在如何看待自己近20年的学术转变?

王晓明:其实,将这种转变放入时代具体环境中看就显得很正常。我是1977年考入华师大中文系,1979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的第二年,随许杰先生和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想起来,当时的大学生一腔热情,很勇敢,但也很无知,可谓“无知者无畏”。其实,现在看来,我对很多事情都是很懵懂的,但当时自以为看了一些书就懂很多了。当然,我们那时的优势是,由于都有文革中进工厂、上山下乡的生活体验,因此,虽然无法理性地想清楚,但是对社会都有一种直觉。

文汇讲堂:直觉具体指什么?

王晓明:当时的同学们普遍认为,“我们遇到了最好的时代”,“我们大学生是这个民族的栋梁”。因为与文革相比,改革是社会的共识,尤其是经历了“拨乱反正”、“真理标准讨论”后,都感觉这个社会很快会有大变革,通过变革,会越来越良性运转,比如,我们都拥护现代化,崇尚自由主义,觉得西方的都是好的;另一方面,由于有这种真诚的冲动和热情,因此,对人是充满信念的。

比起当时,现在的思想上当然有了很大的进步,懂了很多事情。不过,锐气要减少一些,回看当时自己的文章,觉得大框架都是很幼稚的。而这20年中,社会在发生巨大变化,学者要在思想上有进步,研究方式的不变是不可能的。当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又有几个不变?赵园、钱理群、汪晖……时势有时也很残酷,像钱先生(钱谷融)这样有才华的学者,只给了他20年的工作时间、思考时间。而我们这代学者,能工作的时间长得多,逼迫我们在精神上成熟。对我们这代人文学者而言,还有十年的时间,如果到70岁还没有出成果,那只能做点给人写序之类的事务性事情了。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的知识界,整体转向还是比较慢的,可以转得更快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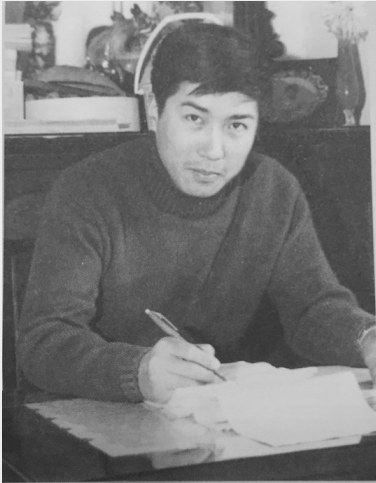
文汇讲堂:快与慢的评价标准是出于怎样的参照呢?

王晓明:我一直认为我们是过渡的一代学人。我们的长处是生活经验多,短处是学术训练不够,另外以我和我熟悉的人来看,我们内心的功利性比较强,防备心也重,严苛一点说,作文做事时内心不够“干净”,也不够勇敢。这些都是和我私人钦佩的前辈学者相比而言,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40年代的那些学者相比而言。具体来说,就是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度、章士钊,还可以上溯到王韬,以及他们的学生:陈独秀、鲁迅等等,这两代思想家和学人,在他们手里,塑造了中国的现代文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与我们这代学人相比,他们的精神气度大得多,并且,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结构,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他们的行动力普遍比我们强得多,比如严复、章太炎都集革命家、学问家、思想家、教育家,甚至政治人物于一身。

文汇讲堂:有学者提出,由于现代大学研究的学



2014年6月14日,王晓明世界各地的学生组织了一场师门集会



青年时的王晓明,一九八一年春节于家中



王晓明认为,研究文学从探索人心开始

在王晓明的辞典里,庸俗和苟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词汇。苟活是意识到自己的庸俗而又无力改变,只能维持现状,苟且存活。庸俗则是意识不到自己的庸俗,而将庸俗本身合理化,甚至神圣化了。做学问已经有30年了,王晓明对此仍有着朴素的理解,他的思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抵抗庸俗,改良人生。

“文学为人生,改良这人生”,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也是在王晓明看来最重要的特质。从现代文学研究起步的王晓明,同时也是这种特质的携带者:“我对于社会人生的关注最初是通过文学达成的。”通过阅读文学来阅读人心,通过体察人心来理解文学,王晓明在这个意义上,和中国现代的伟大作家们实现了思想的对接。中国文学的“中国性”和中国人的“中国性”,是王晓明持续追问的对象,而这样一种鲁迅式的求索,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道路的曲折。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这是今天的学界对王晓明学术“转向”的共识。然而对于他来说,这种“转向”绝不是学术趣味的变化,而是呼应中国社会生活变化的挣扎与蜕变。从得心应手到“扬短避长”,他毫不掩饰地坦露这其中必然包含的尴尬与不适,然而因为一种更长远的、更具洞察力的眼光,他知道,庸俗的时代正在持续,然而庸俗的时代终将过去。“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庸俗,也是全球化下人类的庸俗。”而那个庸俗的时代过去了,是否会迎来一个非庸俗的时代,王晓明不觉得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抗拒庸俗,却是此间的学者必须的抉择。

“读过鲁迅作品的学人,一定是会将个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命运相联系,那样才会觉得人生意义存在。”

在初冬午后的阳光下,王晓明和我们两代后辈学人这样说,是对我们的期许,更是对自我的白描——带着悲观的底色,做着积极的改善。

术专业化分类,不太可能再产生如此通博的学问家了,这也是时代的限制。依据这样的比较,您是过渡的一代,下一代学人会是怎样?

王晓明:相信一代比一代好,现在看来就是机械进化论嘛。但一代有一代的特点是肯定的。

研究文学从探索人心开始—— 读过鲁迅的学人就该是具有中国性的人

文汇讲堂:纵览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我们会看到,无论是鲁迅还是《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关注作家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动因,是您文学研究的特点。是什么导致您如此关注人的内心?

王晓明:“文学是人学”,如果说制度和人心同样重要,那么我更关注人心。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因为人心的表现常让你对中国人感到很矛盾。怎么说呢?现在,身为中国人生存在世界上,我觉得很骄傲。因为中国人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几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些历史会让中国人很聪明,眼光很“毒”,看问题很透彻;然后中国人又对这个世界负有贡献智慧的责任,而且我们有能力担当这个责任,这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多见。美国人无论怎么把历史前溯到欧洲,总是太短;印度历史很长,但往上说700年,就有点说不清楚。但另一方面,这个悠长的历史也带来了社会黑暗、人心病态的累积,让你对中国人的现状很痛心。中国人怎么会这样的呢?于是,你就很想通过文学、作品人物、作家来解读,所以,文学研究一开始也就是带着对社会文化的困惑,只不过借助了文学这个载体,并不存在纯粹的审美解读。

文汇讲堂:从1981年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在时代的重压下——关于鲁迅性格的几个特点》到《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到1995年的专著《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1996年韩国版的《新鲁迅传》,您对鲁迅有持续的关注。《直面》一书出版后,广州的中学生曾写信给您,说您把神的鲁迅还原成了人的鲁迅。您怎么看当年对鲁迅的解读?

王晓明:我的解读是很主观的。但是,鲁迅的确是非常优秀的中国人。尽管他也有他的困难和内心困苦,他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人心。我觉得,鲁迅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的确很深。可以说,鲁迅是让我成为中国人的人,读着鲁迅作品长大的学人,一定是具有中国性的人。中国性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以悲观为底色,但对社会有积极的态度,在此基础上,试图对社会有所改善。我认为,这种心理能量是鲁迅给予我们的。第二,把个人的生命意义和社会命运结合起来。假如说,个人的生活没有联系社会的部分的支撑,那么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不完整的。在康严、陈鲁两代人手,已经过滤了很多传统中比较坏的内容,但是,勇猛精进和颓唐虚无的品质仍然同步存在。在他们那里,中国现代文化被创造出来了,在这种现代文化中,才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这种文学是为人生进步而存在的。

文汇讲堂:心理刻画的特长 in 俄罗斯文学上也有一定的展现,您在联合课程上常举俄罗斯文学的例子,您怎么看俄罗斯现代文学?

王晓明:是的,我认为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相似性,但受东正教的影响,它的视野比中国文学更大。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只关心中国的事情,而俄罗斯文学关心普遍意义上的人的灵魂问题——当然,基本上是欧洲或白种人的灵魂问题。因为母亲曾从事俄国文学翻译,我们楼上就有个俄罗斯老太太,传给我们喝红茶、吃果酱面包的习惯,因此,看到俄罗斯小说中的这些生活场景,我就感到很亲切。小时候跟着父母乱翻书,看的第一部俄罗斯作品就是《战争与和平》,虽然看不懂,但印象深刻。俄罗斯这个民族从蒙古帝国瓦解后产生,俄罗斯人体格粗犷,生命能量充沛,进入现代以后,社会和文化矛盾非常激烈,因此,心理冲突就很凸显,俄罗斯的现代文学作品让我看到了人的内心冲突可以被达到何种深刻程度。

人文精神讨论到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避免落入美国式的学院化

文汇讲堂:1993年,以您为核心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某种程度上也标志了1990年代思想论争的一个起点,从此,一个讨论信仰、认同和精神价值的话语场域被打开了。尤其在“后学”逐渐兴起,“解构”一切被当做口号的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抵抗姿态。这和您转向文化研究是否有关联?

王晓明:两者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1980年代比较宽泛的改革在1990年代被限定在了经济领域。以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来看,自私自利、求生意志、追求物质等等,并不是人性,只是一种生物性。而中国人的未来是和精神性的追求相联。人文精神讨论其实是用一些老的话语来谈新的困惑,如终极价值等等。这种谈话不是说力度不够,而是还不够贴切。于是我们转向文化研究,试图用一种新的学术范式解惑。

(下转第4版)